

1.02

铜梁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铜梁

铜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解放初期在铜梁	李崇仁 (1)
隆重纪念“三·三一”惨案及陈达三烈士殉难六十周年	县政协文史办整理 (9)
“三·三一”惨案志略	(11)
铜梁县农工商学兵援助穗宁渝惨案委员会致省党部快 邸代电	(13)
“三·三一”惨案历险记	刘晖宇 (14)
矢志报国，终身不渝——陈达三烈士生平简介	县政协文史办整理 (18)
陈达三烈士	
新华日报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三版	(27)
陈达三烈士墓志	(28)
北伐军中参谋长陈达三将军墓志铭	(29)
国府追恤陆军中将陈达三之夫人何氏墓志	(31)
国民党空军入伍生总队在铜梁	
胡远信、张钊、阮扬中	(33)
白崇禧在西泉办学校	李其昭 (36)
白崇禧在铜梁西泉二三事	徐竞存 (39)
庚申兵祸——郑英打平滩	杨新民整理 (43)
解放前的铜梁县农业技术推广所	黄国彬、阮扬中 (45)
铜梁县第一个消费合作社——保证责任铜梁县中城镇 消费合作社	阳凌炎 (48)

铜梁高坑电站建成始末·····	杨达明、赵凯 (53)
铜梁蚕丝业史话·····	何中泉、吴家骥 (63)
铜梁黄花今昔·····	朱绣整理 (70)
铜梁特产——磨盘鱼·····	蒋厚道 (75)
铜梁出土文物简介·····	叶作富 (78)
古刹侣俸寺·····	陈政等供稿县政协文史办整理 (81)
古刹波仑寺·····	吴继台 (85)
古刹金钟寺·····	张冠、朱振群 (89)
铜梁解放前公私立医院简介·····	王延庆、刘晖宇 (95)
铜梁县解放前的禁烟情况·····	王延庆 (101)
刘庚唐先生传略·····	周浴凡、田琦 (105)
练哲谔先生事略·····	彭钊立、彭寿南 (107)
铜梁的天主教和耶苏教·····	张顺之 (111)
解放前后铜梁永加天主教的活动情况·····	陆德瑩 (116)

解放初期在铜梁

李崇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到一九五〇年九月，我在铜梁县委工作，至今已三十多年，还有一些深刻的记忆。

在这段时间内，县委在上级党委领导下，主要作了三件事，第一、接管；第二、征粮；第三、剿匪。这三件事交织在一起，差不多是同步进行的。

一、接管

我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后，国民党在四川的反动统治已经土崩瓦解。铜梁遂于十二月二日解放。在铜梁坚持斗争的地下党，推动一部分社会上层人士，成立了铜梁县人民办事处，代行地方政权的职能，并积极宣传党在新区的各项政策。从而稳定了局势，没有出现大的混乱。全县除伪县长和伪警察局长逃跑外，其余全部旧人员都在观望中照旧供职。

解放后的各级党组织，是由南下干部和铜梁地下党的同志组成的。南下干部（西南服务团）在行军的路上，便初步确定了到铜梁工作的名单，十二月十六日到达铜梁，与地下党会师后，进一步建立了充实了县级领导机构，配备了六个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每个区有区委书记、区长和财粮干事等三至五人），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了县人民政府，正式开始了接管工作。

当时接管的总政策，是对各种旧人员、旧武装原封不动的

“包下来”，令其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照常供职，听候接管。过去有恶迹的人员，允许其立功赎罪。这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一方面采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新区各项政策，解除各阶层的思想顾虑；另一方面是在接管过程中，深入了解情况，及时处理接管中出现的问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基本上接管了国民党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包括人员、物资、敌伪档案等都如数接管，没有出现重大的波折和问题。

接管以后，逐步处理了接管的人员、武装。主要的做法是：1、对旧政府一般职员，经过初步审查，多数留用，重新分配了适当的工作，少数老弱病残，遣送回家，适当安置；2、对伪乡、保长，因为当时无力接管和撤换，暂时令其继续供职，在各乡成立农代会加以控制，待以后发动群众，彻底改造；3、对少数党政军头目，根据上级指示，送交地区公安部门集训；4、对接管的武装人员和散兵游勇，根据自身条件，有的收留充实我们的县区武装，有的遣散回家。

总共只有四五十个外来干部，加上新脱产的地下党干部，也不过百人，当时能够比较顺利地接管一个由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败局已定，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许多人已经认清形势，不愿再为国民党效劳，这一大好形势，还迫使一些残留的敌人，欲逃无路，反抗必亡，他们只好暂时归顺，伺机图存。

2、在我们立足未稳，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对一切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对一些有问题的人也没有过早地触动他们，实践证明，中央制定的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

的，我们不仅争取了较多的时间开展宣传活动和发动群众，还对旧人员进行了初步的考核、争取和教育工作，对那些反动分子也起了暂时麻痹的作用。

还有一个原因，是铜梁地下党在解放前夕做了大量工作，解放以后，地下党同志和地下党影响下的进步群众，又都成了各项工作的骨干。当时，特别是稳住了那些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如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及参议长等，这些人没有跑，还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出来做工作，这对稳定局势、顺利接管，都起了重要作用。接管工作正在进行，便开始布置征粮。

二、征 粮

一九五〇年一月初，便接受了征收六七五五万斤公粮的任务。在新区，不可能实行老区的征粮政策，上级指示，仍沿用国民党的办法——按田赋征收，当时叫“普征”。此外，对大户再加征普征数的40—50%，名曰“大户加征”。铜梁当时共有四五万人口，在国民党溃逃前已经征过一次公粮的情况下，人平要缴纳公粮一五〇多斤。当时完成这项任务是有相当困难的，但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因为当时如果没有公粮，便不能解决大批入川军队和大量脱产人员的吃饭问题；便不能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便不能支援城市建设；我们便站不住脚，所以这是一项意义深远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们初来乍到，每区只有四五个干部，自下而上的政权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当时完成任务的主要工作方法，是采用工作队形式，全县共抽调了六百多人（其中有县主办的青训班学员，中小学教员和一部分旧人员），组成征粮工作队，在各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深入基层，开展宣传活动，督促乡、保完成征粮任务。

征粮工作刚刚展开，便闹起土匪，全县大部分地区征粮被迫中断。县委请示地委同意，实行边征粮，边剿匪，或剿匪后再征粮的方针，各区干部和参加征粮队的同志，都以饱满的热情，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斗争，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匪患平定，并完成了征粮任务。

在征粮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政策问题。如按田赋征收的办法，好处是简便易行，群众习惯，但原来的赋元基础不合理，难免有畸轻畸重的问题，而且负担面很窄，全县约有占总户数20—30%的佃农，因为自己没有耕地，也就没有赋元，所以就不负担公粮。这次征收的公粮，实际上是由30%左右的人来负担。这个问题开始并未引起重视，后来才根据上级的规定，向佃中农征收年产量的5—6%佃贫农征收2—3%。

大户加征的政策，问题更多些。所谓“大户”，是指地主说的。政策规定，地主除完成普征粮外，再加征40—50%，当时并不知道全县有多少地主，应完成多少普征粮，便已经定下了二五00多万斤的加征任务。这实际上是以任务来定政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政策与任务的矛盾。什么是地主？当时认为出租土地、不劳而获者都是地主（实际上这里面有许多是小土地出租），因而便一律加征40—50%，这就加重了小地主和小土地出租的负担，便宜了大地主和恶霸地主，这与中央关于新区政策的精神不符。当时县委曾试图把大户加征的政策具体化为：只有少量土地出租，生活相当于中农者，加征20—30%；一般地主加征40—50%；对大地主可加征70—80%（西南局有此指示），但又怕完不成任务，未能

实行。当时是以完成任务为最高原则，加征40—50%的政策规定，实际上是放在参考位置，加征任务轻，可能不到40%；加征任务重，便要超过50%。

因为刚刚解放，征粮任务紧迫，力量有限，又不了解情况，不可能事先经过调查研究，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征粮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实行上述办法。工作做的粗一些，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没有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思想上逐步形成了一种只要任务，不讲政策的单纯任务观点，这对后来的工作危害非浅。

三、剿 匪

一九五〇年一月下旬，征粮工作刚刚展开，土匪便组织暴动。先从靠近大足的边区开始，不到一周的时间，便普及全县。春节前后是土匪最猖獗的时候。当时县境内较大股的土匪及其匪首有：安居陈永质、周隆吉；岚峰的王金谷；虎峰李载荣、严明成；大庙有徐文全；平滩叶灿云、高蜀龙等；这些土匪暴动起来，首先是围攻区政府，捕杀干部，破坏征粮。平滩区被匪围攻，区委副书记被杀害。板桥区被围攻时，我有一个排牺牲。县长王其龙同志等，同军分区的一个团的一个营，由板桥回县城，沿途被匪骚扰一整天，狂叫要“活捉王其龙”。江津基干团政委曹弋笑同志，带领一个营到铜梁，在西泉山上，被匪冷枪射击，中弹牺牲。我到地委开会，由一个连护送，亦遭到伏击。当时已经征收的粮食，基本上被土匪抢光。在土匪最猖獗的时候，他们还试图攻取县城。

这些土匪，不是平常所说的土匪，他们是以预置的国民党特务、恶霸地主为首，以旧武装和蒋军溃散官兵为骨干，裹胁部分群众，收集民间枪支，组织成一支凶恶的反动势

力，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性土匪，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垂死的绝望的挣扎。

这些土匪能够迅速地发展起来，猖獗一时，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我们当时只接管和建立了上层政权，基层政权基本上原封未动，反动封建势力还控制着广大农村，大部分群众对我们还不甚了解，加上他们的反动宣传，还能欺骗一部分群众，这是土匪组织叛乱的重要基础。

当时有人认为，这次匪乱是征粮引起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是不甘心灭亡的，我们不征粮，他们也要捣乱。但征粮工作首先触动了地主阶级，而且工作中又有一些缺点，他们便乘机用来欺骗群众，促使他们过早地叛乱。如果当时工作做得好一些，有可能缩小他们的叛乱规模，或者推迟他们叛乱的时间，越推迟对我们越有利。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反动势力可能组织叛乱估计不足。本来在刚解放的江南各地已经有了经验，来川后看到当时表面平静的现象，思想上有些麻痹，没有尽快地妥善处理乡、保武装和收缴民间枪支，对乡、保长控制不严。土匪已经暴动了，我们还在强调以征粮为中心，没有及时组织力量扑灭，这就给了反动势力以可乘之机。

一九五〇年春节前后，主力部队来我区剿匪，三十五师一个团进驻铜梁县境，还有教导二师、炮兵团等驻铜梁县城。根据川东区党委指示，部队和地方统一组成剿匪委员会，在剿匪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展开了剿匪斗争。

这些土匪，基本上是个乌合之众，本来不堪一击，但他们都是本地人，熟识地形，还有他们的阶级基础，对我们实

行游击战术，这便给清剿部队造成一定的困难，主要是部队人地两生，得不到可靠情报，有时甚至弄不到饭吃，大部队活动常常扑空，有时扑到了，匪又化整为零，混同老百姓一样，很难识别。比较有效的办法有如下几种：

主力部队地方化，分驻各区要地，进剿与驻剿相结合，使土匪无活动余地。部队与地方共同组成的小分队，目标小，活动方便，既是宣传队，又便于消灭小股匪徒。

大部队活动，要有可靠情报。当时，与地下党失掉关系的罗霞村同志到县委接关系，得知他在一股土匪内有熟人，便嘱托他打入匪群。他送来了可靠情报，部队星夜奔袭，将匪包围在如意寺，一网打尽，活捉匪首陈永质等一百多人。这一胜利，影响很大，匪焰开始下降，送情报的这个同志立了一大功。

严格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纠正了只宽不严的偏向。当时将已经捉到的匪首陈永质、王金谷等经过审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毙；对一些胁从分子，经过教育释放回家。各区通过这一事例，积极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瓦解了大量土匪。

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争取瓦解工作。当时有个起义师长何鼎，说有股土匪是他的部下，他愿意招安，答应了他的请求，招回了近百个土匪，特别是通过匪亲属和袍哥关系做瓦解工作收效尤大。

部队和地方紧密配合，努力清剿，到七月份，全县土匪已基本肃清。据初步统计，共毙伤俘匪三〇〇〇多人，投降自新七〇〇〇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剿匪斗争中，部队有少

量伤亡，地方也有二十多个干部牺牲了，我们应该永远怀念他们。

在解放初期的铜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县委主要做了这三件事。这当然都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办的。通过三件事，初步发动了群众，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和封建势力，为建设新铜梁打下了初步基础。

（感谢铜梁党史办和档案馆以及仍在铜梁的老同志，为写此文提供了宝贵资料）。

注：作者李崇仁同志即解放后第一任中共铜梁县委书记赵启光。

隆重纪念“三·三一”惨案 及陈达三烈士殉难六十周年

县政协文史办整理

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是“三·三一”惨案及陈达三烈士殉难六十周年。三月二十八日，重庆市铜梁县联合召开了纪念“三·三一”惨案及陈达三烈士殉难六十周年大会。

早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共铜梁县委副书记陈涛同志根据市委“关于做好纪念“三·三一”惨案六十周年活动准备工作的指示，召开了县属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组成了以县委办公室主任王义昭、宣传部长李德中、组织部副部长蒲瑜、党史工委副主任胡浩等同志为主的负责准备纪念活动的工作班子。县委书记曾令锡，副书记陈涛同志都曾先后到陈达三墓址察看过烈士墓的维修、绿化，墓道修建等情况。县财政拨专款一千二百元，市文管所拨款五千元，县林业局筹资五百元。用以迁走了烈士墓周围的坟四座，修筑了从机耕道到烈士墓约五百米长石板路一条，整修了烈士墓的拜台和栏杆，又从巴岳山运来了湿地松和柳杉十八棵栽在烈士墓周围。县养路段出资三千元修复平整了由铜璧公路东郭路段至烈士墓的机耕道三公里，便利人们去扫墓。

在纪念大会前县党史办撰写了陈达三烈士生平事绩，打印了四百份分发给各有关单位。自三月二十八日起，县广播站以每天三次，每次二十分钟，向全县七十六万人民播送了陈

达三烈士生平事绩。又在县文化馆举办的文化专栏里，介绍了“三·三一”惨案的经过和烈士事迹，读者达一万多人次。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机关党委、教育局、团县委、工会、妇联等部门订购了《重庆党史人物》、《三·三一惨案六十周年专辑》、《漆南薰遗著选编》共九百一十册，即时分发到各党支部、学校、群团组织学习。

三月十八日正在召开的铜梁县第十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和铜梁县政协第三届一次全体会议派出代表五十多人前往陈达三烈士墓祭扫并献了花圈。此后还有机关干部、厂矿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学校师生共一千多人前往烈士墓祭扫。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在县府大礼堂召开的纪念“三·三一”惨案及陈达三烈士殉难六十周年大会上，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黄启璋同志，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胡文华同志，市顾委副主任李成文同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文权同志，市人大副主任刘增跃同志，市政协副主席孟广涵同志，市政府秘书长赵唯彬同志，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领导同志，驻铜56028部队的负责同志，以及陈达三烈士的亲属代表、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厂矿职工、解放军代表共九百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市顾委副主任李成文同志、县委书记曾令锡同志、副书记陈涛同志分别讲了话。县党史工委副主任胡浩同志，县人大副主任银化愚同志，东郭乡党委书记秦光友同志，陈达三烈士的孙子陈久阳和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有五十多名负责同志到陈达三烈士墓前扫墓，并献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和中共四川省委、中共重庆市委、中共铜梁县委的花圈。

（铜梁县党史办供稿）

“三·三一”惨案志略

重庆“三·三一”惨案，系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川军阀屠杀爱国群众之大血案。时当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节节胜利，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中共重庆地委与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协力领导泸顺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四川革命形势亦方兴未艾。中外反动势力慑于革命之声威，惴惴难安，暗中合流，图谋扼杀革命，乃有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南京之暴行，消息传来，重庆市民义愤填膺，遂于三月三十一日集会于通远门之打枪坝，抗议英美暴行。四川军阀阳奉革命，阴蓄异心，与正谋公开叛变之蒋介石勾结，借端发难，镇压革命。是日，到会群众二万余人，大会伊始，刘湘所部师长王陵基、蓝文彬，巴县团阀曹燮阳、申文英，以军警封锁要道，便衣突击会场。顷间，枪声四起，流弹横飞，刀棍并举，血流遍地，与会群众皆赤手空拳，事起仓卒，奔避无及，突围者，九死一生；越城者，断腿折臂。当场死者百余人，伤者逾千。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监委陈达三惨遭枪杀；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漆南薰身殉乱刀之下。翌日，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复遭暗害。六日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亦壮烈牺牲于佛图关。一时黑云压城，腥风遍野。然革命者坚承烈士遗志，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几经起伏，历尽艰辛，越二十二载而迎来巴蜀解放。今者，欣逢盛世，中华腾飞有日，山城振兴在望，仰先烈之伟功。缅前驱之壮志，乃鸠工立碑，以为永志。

大江滚滚，始于涓涓之流；巴山巍巍，原乎粒粒之壤。
六十春秋，赖继往以开来；百世昌荣，寄重任于今朝，树之
前因，嘉果后行，谨记。

铜梁县农工商学兵援助穗宁渝 惨案委员会致省党部快邮代电

重庆莲花池省党部转“三·三一”与难各同志钧鉴：

“三·三一”噩耗传来，敝县各界人士莫不悲愤。诚不意爱国运动竟遭此惨毒也；诚不意青天白日旗帜之下而竟公然演此悲剧也；诚不意帝国主义之工具竟敢在重庆代帝国主义者施行炮舰政策也。但流血愈多，革命进程愈速，从此吾川其有可望乎！诸烈士为主义而伤，伤为成绩；为主义而死，死为鬼雄。吾川僻处西陲，一旦而有千百宋教仁、廖仲恺，则吾川革命精神焉得而不增长乎，革命事业焉得而不发展乎！惟是青草白骨宜吊忠魂，折足穿胸应怜志士。加以出门不返，爹娘哭已死之木兰，为国而亡，鲁人有勿殇之汪錡。血气之伦莫不悲痛，况属同志其何以堪。本会除通电援助外，谨代表铜梁各界掬诚吊慰，尚祈鉴此微忱。

铜梁县农工商学兵援助穗宁渝惨案委员会

注：1、抄自荣昌县档案馆。

“三·三一”惨案历险记

刘 晖 宇

“三·三一”惨案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距今已六十周年了。我是当时大会的参加者，也是惨案的目睹者和幸存者，现根据自己的回忆将历险情况略述于后。

一九二五年，我在重庆英年会中学读书。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革命迅速发展。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九月北伐军占领了武汉，革命已达高潮。四川的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发展很快，一九二五年八月，国民党中央派吴玉章同志回四川，在吴玉章和杨闇公的领导下，改组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为左派领导；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抓紧做军事工作，争取一部分军阀起义和易帜，四川以重庆为中心的革命势力发展起来了。杨闇公和吴玉章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在重庆创办了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学校革命空气甚浓学生思想活跃。我当时正值风华正茂，向往革命，遂与同学多人转入该校中学部读书，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常和国家主义派作对抗宣传。不料，蒋介石叛变革命，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他就与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买办资产阶级勾结，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一面把黑手伸入四川，派戴弁、杨引之、向育仁等来四川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时密令刘湘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共产党势力。戴、杨、向一到重庆，立即同刘湘挂钩，伺机镇压革命。不几天，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